当前现实题材创作艺术提高的一个“硬核”话题

□曾镇南

回溯以鲁迅为旗帜的现代文学新军和肇始于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全国规模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学大军走过来的历史行程，我们会发现，这个文学史行程，和我国现代革命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建设、改革、完善的发展史，几乎是重合的。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产生的名篇佳作，都在时代潮流的推送下，越过一座座时间的峰峦奔赴到我们眼底，把一幅幅历史和时代生活画卷打开在我们面前，可谓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我们的描写人类新世界、创造历史新人物的现当代文学的成就，足以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以自己的卓荦风标，瑰奇华彩，参与到200多年前歌德即已预告并早已来临的“世界文学的时代”中去，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中华新画卷、东方新华章。在文学方面，我们也是可以为伟大而自豪，为深厚而自信的。

中国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传统，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为基础的文学思想主潮和文学创作主潮，并取得了已经写入历史、可以征信校验的如前所述的成就。那么，现在我们就应该接续这个革命文学的传统、人民文学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在已有的优秀作品的名录上增添新作，在已组成的人物形象画廊里增添新人。这就是我们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直面的课题，也是我们当前文学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艺术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因为结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优秀的作品里的美，是可以作为酵母或培养基，作为一种我们已固有的美的范式、美的传统在新的文学时代起长久的化育作用的。只有以我们已经存在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所创造的美，特别是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所积淀而成的新范式、新质素的美为出发点，新时代文学的美，附着在新的文学主题和新的人物形象上的美，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人物形象的创造问题，是优秀作品的核心问题。而优秀作品的不断问世，又是文学事业发轫和运作的枢机，也是文学实绩的铁证与衡尺。我们不妨从催生优秀作品的条件和机制的角度，从人物形象的艺术生命力、美学层次的提升的角度，来探寻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提高问题，来探寻通往伟大作家、杰出作品、典型人物产生的道路。

首先，有志于描写新人，表现新主题、新世界的作家，要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增强历史修养，拓展历史视野，养成浑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登高望远，提升自己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自觉性。孙犁曾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分不开的。历史著作，给中国文学开辟了道路……我主张青年同志多读一些历史书，不要光读文学书。”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于时间，我主张看500年、1000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一定要把它当作一门历史科学来学。为什么说中国面临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要弄清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制定“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在观察和研究新中国史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出两个30年不要相互否定的提法？这些问题，对于作家艺术地掌握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在研究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经验时，对于他为什么要把1975–1985年间的《人民日报》逐年逐月地查阅了一遍并旁及《参考消息》《光明日报》《陕西日报》乃至《延安报》的下“笨”功夫的这种做法，大家从一开始就持有不同看法，究竟应该怎么看？类似的历史知识的积累问题，以及重新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问题，重新学习新中国史、学习党史的问题，其实都应该放到创造典型人物、研究典型人物等艺术课题上来，当成课题中应有之业，艺事中的恒定之旨，真正的创作过程中的必备的工作前提。路遥学习和追溯当代史的扎实工作，保证了他写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人们创造的不平凡的历史画卷，经受住了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历史灵魂的输入，保证了他的作品的新主题的挺立。不只路遥，其实许多大作家在创作他们的富于历史感的大作品时都曾经这样做。如宗璞之于《野葫芦引》、王火之于《战争与人》，乃至张洁之于《无字》、姚雪垠之于《李自成》、魏巍之于《东方》等等。如果对自己所描写的典型人物的大的历史背景和小的活动环境处于一知半解、若明若暗的状态，那么，要想把自己营构的艺术大厦置于坚固牢靠的基础之上，那恐怕是有点困难的。对于新时代新人物的准确艺术塑绘，对于新主题的确立和提炼，要求作家具备切近而明白的历史方位感、历史溯洄感，那就更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新人物的典型性，对于新主题的现实感，作家只有驾驭当代历史大局，盱衡全局、落子局部，才能收放自如，增删有度，让艺术的概括力立于无误无失的地步。人是进化长途、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的中间物，也是具体历史的承载体。艺术形象从受胎到出生，维持其生命、吐纳、脉息的脐带，就连在历史母体的胎壁上。

其次，有志于描写新人、表现新主题新世界的作家，要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呼吸时代气息，采纳时代光影，把握时代精神，辨明时代方向。对风雨交加、纷纭万状、漩流回波、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要有明晰的分际、先进的趋赴，这也是提升典型人物的生命力，扩衍其影响力，延展其普遍性的畅达通道。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这样回顾了五四新文学第一个10年所产生的小说尔后的消长与流变。他指出：“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的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20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做‘滥造’。”

“把时代记在心里”，是鲁迅观察文学史上的高潮期所秉持的知人论世、识时观势的方法，也是他在文艺批评实践中运用“时代的圈”的一个著名的适例。如果我们略微想一想现当代文学史上几次文学高潮及其退潮之后的情形（例如对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10年前后出现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对新时期开始后第一个10年文学创作空前的繁荣及其余波）就会发现，鲁迅对五四新文学第一个10年情形的描绘，几乎是可以移用到这里来的。时势造英雄，时代推杰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催生的鲜花；典型化程度较高的人物形象，是时代记录下的纸上的生灵。时代的精灵，仿佛附灵于作家的身上，潜入他的笔管，吹嘘到他创造的人物形象里面，使它得到“赋能”，有了活力和生气。

这种时代为一代作家创造的人物形象的生命“赋能”的现象，在每一个大时代的洪波涌起，每一次时代进到重大转折点的时候，看得最为分明。特别在应时而作、应运而生的新人形象上。历史的巨川长河，或浩浩荡荡，或回旋曲折，或急湍劲射，或缓流漫卷，有时冲决壅塞，有时荡开寥廓，来到一个新天地，酿成一个新局面，这时，就会有大群的新人出现。他们作为新的时代变局中的“历史的中间物”，进化链上的一环，自然不会是粹然全新，常常杂糅新旧，继往开来，衔接前后，呈现出杂色的样子。但其人物动作的指归，却主要是趋向前进的，在身心裂变中，蝉蜕出一个新的生命来。这样的新人形象，打着特别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时代的尖刺、冲锋的战士，甚至可能会成为朝前仆倒的牺牲者。这样的青年新人形象，带有特定时代的悲剧美，永生在稠人广众之中，被时代的强烈光束所照亮。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青年大学生说：“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不断培养高洁的操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作家朱山坡谈到他参与创作的电影剧本里的主人公黄文秀形象，就很生动、很具体地描写了这块璞玉在时代雕刻刀下雕琢的过程。要把这样的新人写得真实可信，作家只有深入到黄文秀生活过的环境里，浸润、体验一番，才能获得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

其三，有志于描写新人、表现新主题新世界的作家，要在新时代的生活激流中，敏锐地把握生活的血脉，扩大生活经验的获取，夯实自己创作的生活基础，使自己在生活的启迪和驱动下，自然而然地、得心应手地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生成文艺的自然土壤，只能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植根于这种土壤，文艺才能有饱满的生机，创作才会得到坚实的基础。现实题材的创作艺术提升的问题，现实主义的宏放和深化问题，新人形象的创造和新主题的确立和演绎，都要建立在现实生活的深厚基础之上。一定要写生活中“已有的东西”，不能在“写可能有的东西”这一闪烁游移的遁词后头拆掉现实主义的底线。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为立脚点的现实主义创作论的第一块基石，也是最重要的艺术性的基石。因为典型的概括和集中、典型人物的发现和创造，指的就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的深广的反映。而写新人、表现新主题等等问题都可以涵纳进典型人物的塑造这一现实主义美学范畴之内。要想提升艺术，必得下沉生活。要想提高人物概括生活的幅度和深度，提高其典型化的程度，也还得深潜到生活的底部，并尽可能广泛地接触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多见广，思深悟透，才能提升对现实的艺术的掌握能力。典型创造的真谛，其实就在这里。

新时代对作家深入生活，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我认为，虚心地钻研、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把它当作党的理论成果来学，而且把它当作已经形成并不断成长、扩大的人民生活的共同体来学，从理论认识和感性践悟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上，完整地、有厚度、有热度地学习。这是一切对祖国和人民怀着深情，希望用自己的笔为民族的繁荣兴旺、光明前途有所助力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活的洪流已经在我们身边漫卷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会感到自己脱离这一创造的、建设的、奋斗的生活洪流已经很远很久了。在新时期文学高潮兴起和退潮这10年中，一种过于张扬文学创作主体性的思潮；一种把艺术的提高问题、艺术的本质封闭在文学自身内部，以为是可以自我生成和满足的自在物的观念；一种过于耽溺于文学创作的主观因素，过于疏远、漠视已经在生活中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的政治、理论、信念思潮，多多少少有些支配了我们的行动、遮蔽了我们的目光，使我们对现当代文学主潮的优良的文学传统和光荣的文学实绩有些淡忘了、怠慢了、疏略了。这就造成了我们徘徊、踯躅在生活的海边，内视着自己灵魂的小宇宙，低头寻觅着沙滩上的石子和贝壳，却很少抬头举目，向生活的迷人的海多看几眼，更不用说登船扬帆，向生活的海潮冲将过去，体验一把立于涛头，冲波驭浪的快意。是该睁开眼、迈开腿、敞开心，来一次新的学习、新的践履，了解并拥抱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肩负起我们的理想信念赋予我们的使命，投入到生机勃勃的新一轮文学创造的新征程中去。我听一位青年作家感叹地说，他感到自己这些年来从文学教育中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开始崩塌，从文学思潮的迭变中所形成的迷茫和瞀乱渐被惊醒，旧的文学思路被轰毁，新的创作思想被提振，自己需要一个停下来学习社会、学习生活的新的准备期。他的发言使我深受触动。我还惊喜地听到一个年轻的当代文学史教师讲述她的学生读《创业史》几乎治愈了他的抑郁症，使他看到了有意义的生活，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些从我们的文学生活传来的像电光一闪的声音，是怎样使我感到欣悦和共鸣啊。这才是生活的启迪、未来的召唤，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的新时代正在到来的微小却明朗的征兆吧。

创造典型，提高艺术，这是我们讨论现实题材的创作渐渐接近的一个“硬核”。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践履的问题。我们既要稍抑主观以输入创造艺术典型必需的新鲜的客观生活材料，也要荡涤尘垢以纯洁心灵，迎接新的艺术创造的高潮。孙犁曾说过：“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创造典型之途也是一样。文艺工作，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工作，是我们共同负起的神圣的使命。新时代的文学创造的高潮，虽然久经徘徊，但终将确凿地到来。让我们跂足远望，举手欢迎它吧。

在灾难面前

□张雅文

这场灾难来得太突然了！

当全国人民正满怀希望，沉浸在欢度2020这个庚子年春节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带着一个陌生而可怕的名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然在湖北武汉暴发，继而迅速传播开来，传向全国，甚至世界……

翻开人类的历史，人们发现，人类曾暴发过多次严重的疫情：1976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疯狂肆虐，夺去了众多人的生命；1910年，中国东北大规模暴发疫情，六万多国人死于肺鼠疫；而最厉害的，则是在欧洲和非洲猖獗几个世纪，曾虐杀了几千万生灵的“黑死病”……

在灾难降临的生死考验面前，人们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道理，什么名啊、利啊，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而最重要的，是健康地活着！

在灾难面前，人们好像突然明白了许多，发现如此美好的生命，却是如此脆弱又如此令人向往！突然觉得活着真好，今后一定要好好地善待自己，好好地活着！

而对亲人的牵挂，也陡然增加了几分，打电话，发微信，一再叮嘱亲人平安、健康、保重……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突然拉远了。可是，人与人的心却贴得更近，少了接触，却多了牵挂，微信上多了穿梭般的网上祝福。

在这突然袭来的毒魔面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几十亿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武汉那不见硝烟却是生死博弈的战场上，聚集在那些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身上……

此刻，人们发现，这些白衣天使及广大科研人员，承载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希望——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还人类一份安全与健康，还中国一份祥和、太平的环境！

人们发现，这些平时穿着白大褂，在医院走廊里匆匆穿梭的高傲天使，面对随时可能被传染的可怕病毒，却是如此勇敢，如此忘我，如此令人敬佩与牵挂！

人们这才意识到，白衣天使同样是，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样是孩子的父母，他们也会被传染，也会因染上病毒而倒下，甚至可能永远站不起了。但是，在这特殊的时刻，他们却忘我地战斗在第一线，牢记着一句誓言：我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医院就是我的战场！我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拯救他人的生命就是我的职责！

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真刀真枪地面对“敌人”！

当我在电视里看到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吃饭，怕上厕所，戴着尿不湿，当他们脱下防护服时，发现身上的内衣已像水捞一般。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从病情暴发以来，一直战斗在第一线……

有的医生接到染上病毒的同行朋友打来电话，他却在抢救自己的病人，不能前去探望同行朋友，七尺男儿难过得潸然泪下。

而最令人感动，也最令人心疼的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全国人民都记住了。他妻子被冠状病毒感染住院，他本身患有绝症，渐冻症，走路一跛一跛，却用他渐冻的生命，一直坚持奋战在第一线，指挥着全院医护人员与毒魔搏斗……

人们看到一批批解放军医护人员，看到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纷纷驰援武汉，开进与魔鬼博弈的战场……

看到一批批医用物资及生活用品，运到武汉，保证武汉人民的所用所需……

看到钟南山、李兰娟、陈薇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来到武汉，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第一线，研究战胜冠状病毒的药物……

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能战斗、能抗压的民族！中国近14亿人的肩膀，历经磨难，铁打般的坚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精诚团结，众志成诚，凝聚成钢铁般的长城，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同胞们，加油！

我们何曾忘记苦难

□林 玮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与社会苦难经验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文学不仅记录苦难、反思苦难，也在形塑和构建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自我认知。针对群体性悲剧的写作，构成了特定时期人们言说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的重要资源，甚至成为他们精神价值的一部分，历史的经验成就了现实的经验。

不过，现实的经验也可能被阅读的经验所误导。因此，如何接续中国文学史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探索“与天地万物上下同其流”的现代表达，进而发挥文学凝心聚力、泄导情感、反思社会的作用，才是作家和评论家面对的新课题。

多难兴邦的文学记忆：两种传统。

中国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壳变动十分剧烈。无论是联合国的相关报告，还是个体经验的记忆中，中国的自然灾害发生总是频繁而多样。“旧创未复，新祸又起，这已成为我国历史上极常见的事实”。这种事实对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史传文学中，关于灾异记录的数量、内容以及连续性上，在世界上几乎是最多的。从《史记》开始设“天官”专章，整部中国史每朝每代都有“五行志”，晚至《清史稿》则专称“灾异志”。这种史不绝书的灾异现象，早已深刻地浸润至民族记忆的深处，并伴随着祭天招魂、伤春悲秋、禳灾祈福与善恶因果等多种文学写作旨趣。

中国文学对灾难的表达，大体可以分为上下两层传统。就民间传统来说，频发的灾难促使人们产生了及时行乐或避世逍遥的观念，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学中对隐逸、仙传等话题兴趣盎然。可是，在现实中，个体又不得不面对灾难导致的无常，其恐惧需要在文学审美活动中得到化解，因为生活总要继续，尽快擦干眼泪、抚平伤痛，才能更好地朝前走。这就使得中国文学长期处于“乐天”状态之中，“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那些受众广泛的民间文学，总是倾向大团圆的结局，而且这种状况越往后发展就越成熟，明清时期的戏曲与小说尤为明显。因此，现代以来，关于“中国有没有悲剧”的讨论，在齐如山、王国维、鲁迅，乃至朱光潜、钱锺书等人眼中，答案是显豁的，那就是基本没有。

但是，从士大夫阶层的写作来看，这一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回答了。中国文人的写作在汉魏之际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觉意识，对灾难的理解也转向更加深刻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们把灾难变成一种写作的底色，灾难现象在他们那里被转化为一种灾难精神，即面对人世的无常、宇宙的无限、未来的无知，个体变渺小了，生命变脆弱了，灵魂变孤独了，精神变漂泊了，人生变短暂了。这种文学意识成了中国文学的潜层，为中国人的灾难记忆赋上了厚重的人文关怀色彩。

民族精神的价值转化：三条路径。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分野，是因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与灾难之间达成了一种斗争中的和谐。这种关系是以人为中心的，即人可以战胜灾难，或者说与灾难共存。它不仅指现实层面，更指精神层面。譬如同样是宇宙洪荒的创世神话，西方基督教文化以神力实现救赎，寄望于诺亚方舟；而中国则完全以人力为基础，创造了“治水”这一绵延数千年的、表达人与自然灾难之间不断斗争、相互妥协的文学母题。无论是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还是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都象征着文学对灾难现象的价值转化。它通过人和自然的斗争，使人类有限的生命得以与浩瀚、无限、辽阔等宇宙属性相关联，从而以一种深刻的悲壮和崇高之美，让灾难沉淀为力透纸背的人文价值。这绝非是某些人口中轻飘的说辞：“中国人有种独特的灾难美学，那就是忘记苦难”。中国人是把苦难积淀成了深沉而稳定的民族精神！

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人对待灾难的这种人文态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以把它认作是对灾难现象进行价值转化，进而凝练为民族精神的三条路径。

首先是中国士大夫特有的忧患意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屈原《天问》开始，自然与人世之间就在文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忧患关联。这种关联虽然主要集中发源于动荡不安的汉魏时期，但它并没有因历史进入太平盛世而消失，甚至在盛唐时仍蔚为大观。更重要的是，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表现为对治乱兴衰的反思与居安思危的紧迫，还升华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超越性人文情怀。这种情怀在宋代成为普遍的士大夫认知，出现了诸多名篇，更被儒家抽象为“居敬”功夫。

其次是这种源自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在宋元时期通过话本、戏曲、小说等相对大众的文学写作，泛化出中国式的悲剧观念。其集大成者为《红楼梦》，还有《桃花扇》《窦娥冤》《琵琶记》《雷峰塔》等戏曲。这种为大众所接受的悲剧，把写作目标转化为普通底层“小人物”，其中不少是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把文人的忧患意识通俗化为对现世的观照，对个体经验的提升；同时，又用“大团圆”来对其予以慰藉，在苦难中注入一种便于解释、易于接受的善恶因果观。

经过上述两个阶段的文学书写，中国人对灾难的艺术认识已经颇显立体。它的书写对象从自然逐渐变到人世，同时也从灾难向苦难、从人类向个体转移。这一题材的创作，始终呈现出兼具反思与抚慰作用的价值特色。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急转而进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演进，为新时期以来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苦难叙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诞生了《云中记》《白鹿原》《白雪乌鸦》等更加复杂、深刻的文本。

风险社会的共同情感：一个前景。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开始日渐清晰地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有重大风险的应对和化解能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而所谓“风险社会”，就是人们对“灾难”的认识从偏向消极、否定的“苦难”转为一种相对日常的警惕之心，以及适度的社会动员。相应地，其文学书写的主流也应由灾难、苦难，转化为对风险的认知和把握。

概括地说，上述三个阶段都属于风险社会之前的苦难文学写作。其中，第三阶段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之书写，虽然出现已有将前两条路径——深层的忧患意识与通俗的精神抚慰——相结合的端倪，但整体上还是在西方社会批判意识影响下出现的现实主义创作。这条路径的苦难书写，尤其要注意避免引发“共情伤害”，甚至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中。

而进入风险社会之后，未来一段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就对风险社会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仅需要及时面向社会、思考现实，更需要继承中国文学的忧患传统，继承怵惕警醒的居敬功夫，并将这一传统融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命题之中，使其重新彰显出“与天地万物上下同其流”的深沉人文关怀。同时，还需要适度的文学张力，来缓和风险社会自带的强大压力，对“大团圆”的中国写作经验做新的反思，包括融入调侃、幽默等元素，来实现对上述三个阶段、三条路径的汇流与统合。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已有此种意味的显现。